

导 论

个人回归国际政治：幻想与发明

米歇尔·吉拉尔

一、国际政治

在一个由一些完全分化但基础牢固的政治实体构成的世界上，政治如同一枚钱币有正反两面那样也有两面，国内的一面向内，国际的一面向外。这两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彼此不可分割和不可缺少。因此，只要有了城邦、帝国或国家，这些城邦、帝国或国家就不得不像连体婴儿那样保持一种彼此互相依赖又互不理解的模糊状态。

知识界的大多数人曾经大胆或轻率地想要忽视或取消政治领域中国内和国际这两个方面分界线，试图调和这两个方面，但现在似乎主要局限于发表一些意向声明或者简单地表明诚意，有时求助于某些玩魔术似的文字游戏。

在一个由众多社会和国家构成的世界上，这种政治上的先天划分后果严重。按照我们对政治的两个方面所下的定义，这种划分会引起我们对国际政治的两种不同理解之间的根本分歧。按照第一种积极和固有的、严密但狭隘的、对热爱光明和传统的人来说是宝贵的观念，所有涉及各种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的现象都属于国际政治。因此，所谓国家间的就是国际的。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与把政治和管理人民及国家的政府联系在起的传统看法完全一致。在第二种消极和非固有的、广泛但混杂的观念中，国际政治包括所

有超出国内关系领域的现象。因此，所有不完全属于国内的现象就是国际的现象。这第二种定义更适合于吸引那些有冒险精神的人或理想主义者，更适合于那些梦想结束政治分离悲剧的人。^①这第二种定义与被理解为行使一种并不一定具有政府性质的权力的广义的“政治”十分协调。这两种关于国际政治的观念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量的区别，而且是质的区别，因为这两种观念严格地说来是无法类比的。^②在本世纪中，从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来看，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可以被解释成这两种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之间有时微妙有时含糊的长期决斗。赞成第一种论点的人从逻辑出发倾向于捍卫国际政治分析的特殊性，支持第二种论点的人则倾向于使这种分析平凡化，把它纳入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权利。老实说，在国际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在这两种看问题的方法之间犹豫不决，而且受到一种可怕的片面性的影响，这种片面性是专业研究的一个不明显的标志。^③

关心个人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几乎必然会促使人们去摆脱

- 1 关于国际政治是从国内政治分离出来的这一 定义已经决定了 前者从属于后者这种微妙的形式。这种定义也比较符合山于国内的某些因素而限制了国际政治的一些企图。关上 我们所说的这种限制的各种表现形式已有比较全面的评论，参见 K. N.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60 页，朗多姆出版社，1979。
- 2 关于国家间的政治为“最小”，国内的政治为“最大”的说法，以及跨国 现象在政治上不明智的种种陈旧 描述早就存在。因此，关于跨国现象的研究也经常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在这方面最早出版的一本书，虽然提法上 有些自相矛盾，但明确提出跨国关系受政府操纵，同时又完全不受国家控制。参见 R. O. 基奥恩、约瑟夫·奈：《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
- 3 这种对问题的片面性认识是公开受到争议的，不管是为了纠正对这一 问题的认识，还是从理论上 对问题有个合适的解释。出于前一种目的，华尔兹提出国家的特殊因素对国际政治具有影响。参见华尔兹 1979 年著《国际关系理论》一书的第二、三、四章。出于第二种目的，J. N. 罗西瑙试图从理论上 阐述世界政治中世界分裂为两个世界，参见罗西瑙：《世界政治中的动荡 —— 变化及持续性的理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

那种几乎不给个人保留任何地位的国家间定义，而去接受那种宽宏大量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切不仅仅属于国内政治的事务都可以被宣布为国际事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对国际政治的广义理解更加吸引人，而在那种固有看法的众多信徒那里，个人的前景立即成为被抛弃的对象。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仍然依恋现实主义传统最基本逻辑的人来说，将个人—公民纳入国际政治范畴的想法体现了一种流派的混合或一种近似于精神错乱的不协调。然而，不管这种想法多么引起混乱或不协调，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提出个人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还是值得的。

二、个 人

个人的概念和个人主义的概念完全一样，都有深刻的含义，这种思想和这个词都有很长的历史。^①从17世纪起，个人(individu)的概念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不可分割的原子(indi-viduum)”的延续，开始专用于人。^②也是从这个时期起，个人被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本质上不同于政治社会及其可变的配置。^③此后，这种个人模式被千方百计地拒绝，但是大多数为个人谋求某种地位的学说及政治和社会分析却碰到了一种逻辑上的矛盾：只有以牺牲一切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特性为代价，个性才会得到全面的考虑。因此，大多数唯心主义取向的观点使人们把（往往是单数的）个人看成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抽象概念，在这种抽象概念中，一切特性都被否定或取消。例如在黑格尔那里，个人只有以一种客观的形式存在于一个无限超

① 个人主义一词的历史起源，可参见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1～2页，牛津，巴西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73。

② 参见诺贝尔·埃利亚斯著：《个人的社会》，第207～215页，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1。

③ 同注释1，第73～78页。

越他的民族的精神的历史现实中，才是有思想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学家路易·迪蒙以同样抽象的方式提出一种思想上的个人，定义为完全独立于社会的精神上的存在、是现代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有产物。更现实主义的人和社会的概念原则上更加尊重各种实际的特性，有意识地谈到复数的个人，但通常倾向于使这些个人服从更庞大的政治实体和社会实体。可以说，理论上的个人主义在这方面往往被局限于很小的范围。马克思和迪尔凯姆以两种很不相同而又确实不太个人主义的笔调使人隐约看到一种反鲁宾逊式的具体个人，因为这种具体的个人基本上受超过其自身范围的历史规律或社会规律支配的。

的确，注意个人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假定个人以某种方式决定国际政治也许不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在有些人看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应该与理论上的个人主义完全分开，即使两者显然十分和谐。³按照这种思路、用微观政治秩序的一些要素来解释宏观政治秩序的一些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因素的因果性。不管怎样应该指出，从这些个人原子出发来澄清国际政治的巨大分子的现象是一件比较有风险的事。尽管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能够提供关于某些局部或地区性现象的概况，例如排除等候的拥挤所造成的影响、无票旅客的行为或“帅克主义(svejkisme)”对一些组织的好心破坏等等，但是在

参见让·依波利特：《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第19～20页，巴黎，马赛尔·利维尔出版社，1968（1948年首版）

参见路易·迪蒙：《论个人主义》，面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瞻望》，第27页和271页，巴黎瑟伊出版，1983

关于个人主义两种形式的区分，参见莱蒙·布东和乔恩·埃尔斯特特的文章，载于皮埃尔·布伯姆和让·勒加合编的：《关于个人主义》，巴黎政治学国家基金会出版社，1986年及1991年。

关于个人不受约束的这种特殊形式，参见F. G. 贝利：《个人的王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3。

关于国际政治的解释方面，迄今为止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这种个人主义，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由各种整体范畴的世界的展开。

读者将在本书中看到的个人，有时是被认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处于特殊地位的历史性人物，由一个具体的人（例如亨利·邓南特）；有时是具有普遍分析价值的结构，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作者，这种结构或者是理想型的个人，是按韦伯的方式构成的解释工具，使实在的个人的某些特点风格化，或者是模态化的个人，被认为准确地概括了一群特定个人最常有的特点的个人。可以说，当读者尚未接触到某些特殊的和被认同的个人，他就会碰到一些抽象的个人，这些个人尽管被他们的集体归属、效忠、关联或认同所限定，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剥夺了他们本身的特性。

这里所谈到的个人，首先是有意选择的普通人，这些普通人与他们所在的社会和阶层的其他成员有着共同的认识，行为同样平凡，可以说是无名的公民。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引起了人们特别的注意，他们不仅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摆脱他们所处的平庸的处境，而且在境遇上、有时还在身分上处于与众不同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主要通过他们的职业、家庭、出身或国际政治的种种偶然事件，被置于仅仅对国家效忠这一假想的普通法之外，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情况。更为少见的是，尽管他们并未担任任何官方的政治职务，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以某种头衔获得可跻身于国际人物之列的声誉，可以引起对他们的重视和认可，并因此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施加影响和采取特别行动。

对于国家元首和政治首脑及其代表或代理人等这些官方负责

对“公民”一词的模糊概念有种明确的论述，参见皮·布伯姆及让·勒加合著；《关于个人主义》，一书中勒加撰写的“个人主义与公民身份”章，见第159～209页。

人，本书未予以考虑。而作为代表政治团体的活的标记，有时这些政治团体根据情况把自己作为“集体的个人”，这些人由于他们表面上与普通人的身分不同，故与本书所指的个人完全不是一码事。因为在他们常常以显贵的姿态和过分耀眼的风采出现在国际政治前台之时，他们的个人特征几乎成为一种仅仅供人观赏而徒有其表的玩艺儿。这些人往往特别得到编年史家、历史学家以及某些政客的青睐，总是同媒体及公众给予他们的地位融为一体，其结果，在众人眼里，与他们相比，那些纯粹的和普通的个人在世界政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便相形见绌了。那些国际政治机构的负责人，因为他们仅仅作为了已经确认的对象或既定的工具，因而，在本书中，这部分个人将作为普通的个人出现。

在个人化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人处于同一个程度和表现为同一种形式，加之各种政治和社会的个体化形式完全可以把一个共同体变为另外一个共同体。在这一转变之中，发达的西方社会，其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个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遗产，在其长期积累整个工作全部成果的过程中，便已经具备了使之成为这样的人所需的实践、想法和感性知识，与此同时这也就使其与原来的集体明显区别开来，不与之对应或这个个人设法离开他原来的集体，在一个较为传统的社会里，其个人化的过程可能是比较缓慢的，且有另一种性质。个人这一新描绘的概念，如同我们所构画的那样，还在摸索其方向，而个人化的实际情况亦有其特点，尽管在一个有关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扩展、民主模式的漫延，以及与现代特性普遍相联系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推动的相当平等的逻辑或与这种逻辑共处，仍然会经常处于优势地位，并将制造缺乏个人化的人类，起码是在一个易于变成“个个人”的有权威的实体之

作家 V. S. 内波尔的说法，见皮埃尔·帕歇：《从一个到一个——论文学中的个人主义》，第 78~79 页，巴黎，瑟伊出版社，1993。

外，情况会是这样的。

三、排斥与回归

下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个人的问题，自从我们所说的现代国家在欧洲开始建立以来，似乎一直都在激励人们去思考这一国际政治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代的初期，对人的思考曾经是那么一些人共同从事的事情，这是一些试图公正仲裁亲王之间关系和竭尽全力以便更加有力地拖延战争爆发的人。在 17 世纪与 18 世纪末期间，人权变成了国权，尽管从那时起，个人这个谜被宣布为越轨和超出研究范围，但它仍一直回荡在人们的脑际并反映在政治思想之中。通过这一纯粹为直观的感觉与作用，我们有时便以为，在近两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分析中，个人主义的观点几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对跨国家事务的看法，在个人原则上被遗忘了的情况下，总是难以处处让人接受。即使它得到发展自己的机会，但取得成功也不是轻易就能够让人接受的。个人几乎从世界政治中彻底消失，事实上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只要看看我们当前正在从事的对个人发展所具有的真正创造性，便一目了然了。

“战争不会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只会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让·雅克·卢梭对战争的发生曾经作过两次这样的评论。^①今天，我们认为，这一似是而非的东西一直对卢梭起着支配作用，这种判断战争的程式与其政治思想十分和谐，且又恰恰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想法相一致。这位哲学家，作为一个传统的人，他对战争的评论是围绕反战，即界乎于社会和自然人，换言之，在政

① 见让·雅克·卢梭：《战争状态》一文，载于《圣-皮埃尔教长传记》，《全集》第三卷，第 604 页，巴黎，加利马出版社，1964。

治团体和个人之间展开的。卢梭认为，从其本性讲，人是温良而热爱和平的，在其拥有“有限权力”的情况下，人则有一个由自然规定且不可超越的固有能力，人在思考壮大自己，但都处在弱小状态中，相反，一个国家则无任何东西限定它，“其自身力量变化是无限的”，它可以按照自身可靠性以及储备，按照自己强于其邻国的要求来增加自己的力量。结论似乎是把雷蒙·阿隆的“战争状态是大国间的自然现象”这一现实主义观念提前了两个世纪。另外，进入战争行动是国家间的事，而没有个人的分。按照让-雅克·卢梭的推理，国际政治的这样一种看法是按逻辑分类而明显反映出来的，即：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的数量级上的差别。这两个数量级是不可类比的，属于国家的政策，便不属于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按照这一更具说服力的逻辑，人们便有理由把公民们排斥出国际政治之外。此外，在另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这位哲学家更加坚持其将个人置于国际政治之外的看法。他在该文中说，“国家采取的对外行动不适于人民，”人民则应当将对外行动报告其政府。作为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怎么能不指出，这种想法，即在国内行动中承认个人、公民和现代民主思想的相容性，而对外行动中怎么可能把个人公民和现代民主如此彻底地对立起来呢？

从格劳秀斯到让-雅克·卢梭生活的时代，所定下这对个人排斥的总原则未超过一个世纪，这期间，人权几乎被剥夺而变成了国家的权力。思想家德·莱德认为，国际关系的权力，其排列顺序起码应当是，人与国家同等重要。当然，格劳秀斯所关注的

从“个人”一词派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者”一词大约在18世纪中期在法国就已经存在了。

见让·雅克·卢梭：《由理书信》之七，《全集》第三卷，第826~827页，巴黎，加利马出版社，1961。

似乎是抽象的人类，在他眼里，人已经变得非常个人化；但同样在他眼里，人原则上为个人，仅从这个词本身而不是从其含义讲，则是为时代的错误付出一定代价。在他把目光投到国际政治的同时，格劳秀斯的那个世纪似乎已为个人设想出那种孩提时期的许诺，在 18 世纪时，既不能亦不愿意信守。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对我们关于国际政治世界的认识根源无疑包含有部分的神秘感，因而今天人们对这个谜更加困惑不解。

认为圣·皮埃尔教士和让-雅克·卢梭所持的一种观点，在 150 年间均为大家接受，似乎是不够慎重。由于我们要撰写新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出于对历史的忘怀和无知，以及同样是为了根据现实主义这一信条，我们大都会轻易相信，跨国家的观点曾经支配了 19 世纪人们的国际政治观。然而举例讲，由康德所开创的哲学和伦理传统，由科布登所阐明的自由——激进的思想学派，由普鲁东所代表的近似于“空想”的社会主义，由马克思推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析，或者基督教世界主义的各种思潮，均公开地，在坚持个人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上作出了贡献。在 20 世纪，世界封闭状态的结束，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价值观的发展，民主的进步，可能改变国界的国际主义大动员的惊人发现和叮摧毁世界的首次世界性冲突，这些同样大大有助于 1918～1930 年期间的那种相当有利于个人主义逻辑的理想主义的复苏，而这种个人主义的逻辑，应当是现代的和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的基础之一，自 1939 年以来成功地给予揭示。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冷战的冲突和紧迫的意识形态斗争造成极端严酷的现实，使理想主义的主题全而失去了声誉。

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跨国家的行为似乎一下变得独领风骚了。其

影响导致的将个人主义观点全面抹掉的进程因此而远未终结。正是在此时，出现与古典现实主义趋同的倾向，但从 60 年代起，便为那些对个人主义很有利的系统论和结构主义观念部分地取而代之。同样，当 70 年代人们热衷于考虑组建集体组织诸如 OBG 或公司的时候，跨国现象中的个人主义范畴并未列入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中。

个人重新出现于国际政治理论之中，其时间是在 80 年代。这一回再现之初起码在形式上，表现极为谨慎。而后，即在 90 年代，伴随着詹姆斯·N. 罗西瑙写的一部书的出版，个人便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在该书中，个人占据着绝对的中心地位。该书作者在发展与深化前人工作的同时，明显地为混沌理论所深深激励，因而把个人置于可能会在世界政治中引起史无前例具有轰动历史的重要地位。^③按照该书作者的想法，从今往后可用三个参照系来解释全球政治活力出现的微小的可控性质。而微观政治的参照系，因其涉及个人问题，故而从长远看，是最具决定意义的。这个与个人相关的参照系竭尽全力对现代的几个政治范畴进行综合，该参照系，在最近的数十年间，主要受到来自微电子革命的极大冲击；其结果是，在个人中间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腐蚀现象，一种消极被动服从的习性为一种积极适应的过程所取代，与此同时，他们在国际政治方面的分析能力和情感投资能力亦明显提高。

但愿一个同样知名的，且在行为主义和先结构——功利主义行动上坚定的作者，能够起码部分地接受那种似乎有一定理论性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并由此展现一种新的知识环境独创的非凡过程，

1.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公民与非公民关系的论述，可参见安德鲁·林克莱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与公民》*，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2。
2. 参见詹姆斯·N. 罗西瑙：*《世界政治中的动荡》*，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
3. 参见詹姆斯·N. 罗西瑙：*《旅游者与恐怖主义者》*一文，载于*《世界相互依存研究》*一书第 73~105 页，弗朗西丝·平特出版社，1980。

在这个环境中个人又有兴趣并在国际政治的分析中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公民权。

四、幻想与发明

个人主义的问题，新近重新再现于国际政治的分析中，可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事件，而这可能是坚持某些深深扎了根的现代幻想的新的表现，这种现象的出现，在进行有关个人认识方面的探索，表明有相当的阻力。

在这些现代幻想之中，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种是，它希望能够用微小的代价，为现今个人的重新发现进行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它亦想用极端高昂的热情进行现时的深入的理论更新，而这一新的和从根本上改变现状的主张，对于那些理论“创新”的鼓动者来说，尤其从政治和社会方面，便自然构成了基本的论据，但这些人又不赞同对过去即已形成的观念进行过分正面的批判。在现实政治世界进行独创的前提，一种可以把自己分析的观点说成是一种创新这一前提，因受到其鼓吹，各种思想均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运气而感到满意，便得到了更多的机会。进行这种鼓吹，其论据存在着双重弊端，一方面是竭力鼓动人们预测更新中的经验主义现象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允许人们缩小其观察经验主义现象的历史空间的深度。但愿那些已被告知的学者或可能被告知的学者们能轻易相信，他们是一个历史的和完全特殊的动荡时期的见证人和有权威的分析家。而这可以让人设想，即对于那些更为年青的人来说，他们会更为自然地认为，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新的，当然对于它自己也是新的。

另外一种幻想可能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坚持个人主义的典型性问题，这种幻想是与观察家本身的主观主义密切相关的。不应忽略的是，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兴趣，即有兴趣在一张图上，也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现自己，有兴趣在一个自己本身出场的

象征性标记上确认自己。接受个人主义的一张大的王牌难道不正是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似乎不像如此多的人那么混乱吗？常常存在的可能是，人们在私下提出的假设太合情理了。而按照这种假设，个人可能会不无天真地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总是重要的，因而也就没有足够的必要就关键性的条件问题反躬自问了，然而，正是这些条件，根据不同的情况使个人的干预或变得有效或变成幻想。对自己（及其同类人）超乎寻常的过高估计，由于在现实中不同范畴之间的交往常常突然中断，其危险性便因此而提高了；与此同时，这种危险还表现为，在未对宏观政治的作用作相应的验证的情况下，便支持个人的行动。这样作难道仅仅是为了回避所要克服的这些巨大的困难，即通过对个人这些原子聚合的复杂过程而最终组成了国际政治最亲密的物理大分子进行详细分析的困难吗？在某些自我过分陶醉的情况下，甚至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有一种潜伏的思想认为外部世界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它自己，这似乎表明，世界政治即变成了节目或噪音和变为经过认真装璜的东西，通过媒体不间断地在家家回响或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扩散。所有这些由主观主义臆造出来的现象，让人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窥测，世界政治的非个人主义观念，在所有人看来均可能表现得很模糊，均可能让人在分析过程中，保持客观的立场，因为分析家个人并未直接介入其中，他在行动中可持更为有效的立场，因为集体行动的限制则更易于从中找到认识上的合理性。

世界政治的个人主义倾向同样会使系统地低估大集体作用的受到鼓励，而作为大集体的补偿部分，重估个人的利益则难以避免。对于个人的特殊关注以及解释宏观政治范畴与个人范畴的关系中常常会碰到极端的困难，使人一看便知，这是对大集体重要性的无知。按照这种情况，国家作为集体的国王，它将被遗忘，其存在将被否定或予以回避，其地位将被超越等。这样，国家将成为第一个受害者，因为来自理想主义或跨国家的批评进一步增强

了无视大集体的这种可能性，所有其他机构，即超国家的、隶属于国家的抑或跨国家的机构，均无法回避由这种原则性的贬值而遭受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所有宏观政治机构的地位问题、义务问题及集体行动问题等。绝大部分集体参照价值失去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可能间接地使现代的个人成为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和没有原因的原因，成为社会痼疾及丧失政治理想的一个后现代的鲁滨逊，个人成了从此失去目的的历史和前途渺茫的世界社会的自由但又软弱的对象。

所有这些假象，只要其能够立足于今天正在编织的特殊类型的知识环境的政治与社会基础之上，便不会那么可怕了。

令人十分高兴的是，个人重返国际政治分析之中已经不仅仅是巨大而相当可惧的空想了，因为除此之外个人重返国际政治分析中还可作为知识的积极或富有成效的演变开辟道路。

如同绝大部分后来的理论发展时期一样，现实主义以成功地排斥个人为特点的时期不仅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关系伦理道德脱离社会化的进程，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伦理道德的激情向平庸的实用主义转化的持续进程。当前个人重返国际政治的分析，对于个人伦理道德观可能重新确立于国际政治的思想上和行动中，肯定构成了一个必要的条件，暂且不说是一个足够的条件。经验式的和规范化的理论的持续调和，现今的可能性似乎还不很大，这就肯定会促使人去设想让一个经验式的个人同道德的融洽相会。但是后现代的个人还可能是原来意义上的人吗？

同样可能的是，个人的复苏会导致同那样一些空话套话发生有益的决裂，这些最常见于他们自己领域的选举中的空话套话有时似乎是充满了鬼计，以致于其中对国际政治的分析总是装出一

副令人遗憾的姿态，并以一种宗教的方式，像重复某种信条一样反复陈述时下人们喜欢的老一套：新的角色，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的新的平衡，新的国际秩序，等等。当然，这类分析即对构成整体的典型结构的复杂的总体特性竭力加以研究，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这势必要承认，所有可能促使自己本领域发生那种常见的解体的行为，都可能给那样一些国际学家带来巨大的帮助，因为他们正受到比他们自认为还要大的威胁，而这一威胁则由本地区的教义导致知识僵化所造成。这样，对面向外部的国家进行瓦解，其结果，可能带来大量新的发现，其中尤其是那种带有过分神秘主义和合理的结构主义观念具有难以持久性质的发现，而对于这种观念，大部分分析家则仍在研究中。同样，OIG 和 ONG 以及跨国公司和其他组织（国家的、人民的、社会的、阶级的、团体的、等等）这些国际政治分析的群体的解体，可能使人们透过“子整体（holons）”这种简单的表面现象，发现跨个人系统及穿过这一跨个人系统过程的真正复杂性；通过个人重返国际政治分析之中这一似是而非的结果看到，个人本身从“复杂”向“简单”过渡给人提供了重新发现政治现象真正复杂性的宝贵机会。

从最终的结果而言，个人介入国际政治分析可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无可争论地推动其放弃它以往过分喜欢的宏观政治可爱的一般性那一过分装饰的场所——但愿这是基于直观和文学的形式或存在于形式主义的和学者的文献中——以便对那些常常出现但并非一贯存在的和对那些更易于发现和更易于进行准确和明晰理解的微观政治进程进行准确分析。为了使国际政治的分析不致于陷入天真的描绘或主观主义的或似是而非的幻想之中，在国际政治的分析中对个人的考虑可能会给国际学家提供那些明显地是他们最缺少的东西：一个广阔的经验式的天地，一个给予他们既取代了现实的原则又给其提供发展个人空间的天地。

第 一 部 分

伦理道德和认识论问题

第一章

在决策论和结构主义之间：国际关系 理论中脆弱的个人伦理道德

克劳斯-格尔德·吉森

冷战后的时代似乎出现了这样一些特点：跨国家结构的动摇，新的冲突阵线的产生，严酷的地区纷争，国家利益迅速地向次国家团体（种族和宗教团体等）或超国家一体化结构和跨国网络系统转移，等等。国际关系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可能表明，在此之前，一些研究者对旨在解开 70 年代和 80 年代那个变得过分不稳、充满风暴年代里的理论之结而开始进行的研究，可能会有助于打开探索更加有效地缓解因柏林墙倒塌而孕育着深层冲击的新的视野。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探索者们的种种发现中，还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个人这个群岛的可能出现。但是这个既神秘莫测又几乎难以靠近的群岛，在国际关系专家们优先考虑的诸多问题的汪洋大海中，却显得那么遥远。

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航行，总是既艰难而又叫人发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请那位名叫詹姆斯·罗西瑙的船长来，情况也会一样。因为必须按照船上的规矩，即按照一个已经失效的理论指南来航行。因此，当这位探索者认定“那些公民的意愿和行动，他们的权威和活力正日趋增长，愈来愈产生导致世界政治具有全